

明中晚期士人社集與思潮發展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張藝曦

一、三股風潮與社集活動¹

十六、十七世紀，即中國的明代中晚期及明清之際，各地出現許多士人組成的社集，在此之前雖然也有一些社集的記錄，但在數量上沒有這段時期多，也因此吸引不少研究者的關注。過去研究者多會放在文學史及政治史的脈絡下討論，郭紹虞的《明代的人文集團》與謝國楨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正是這方面的名作，而且近幾十年還持續有不少精彩的論著問世。²本文則希望改換眼光，轉從明中晚期三股思想文化風潮的角度來談社集活動。

明中晚期的三股風潮分別是：前後七子（尤其是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陽明心學運動、以及以復社為首的制藝（即八股文）風潮。因應於這三股風潮，則有詩文社集、心學講會，以及制藝文社的流行。從時間軸來看，天啟朝以前，也就是一六二〇年以前，詩文社集（尤其是詩社）³及陽明學講會的發展都曾臻於極盛，而在萬曆末年左右，聲勢才被新興的制藝文社所凌駕而過，於是制藝文社引領接下來二三十年的風氣，直迄明亡而止。

文學復古運動中，復古派提倡一種寓創新於復古的文學主張，⁴講究模擬前人詩作，由於方法直截簡易，所以受到不少人的歡迎，隨著運動的盛行，民間詩壇也日益活躍，作詩的已不僅限於士大夫，還有許許多多的中下層士人或布衣處士的加入，這讓明中期以後的詩作數量達到高峰。⁵

陽明心學也有向下層傳播的一面。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九）的心學除了提出「致良知」而有其思想上的創獲以外，王守仁的門人弟子更藉由舉行講會，以及從事各項社會福利工作，吸引大批中下層士人及布衣處士的跟隨，而且更進一步觸及到閭里間的庶民百姓。傳統儒學本就有往下走的趨向，孔子的「有教無類」就是一例，而陽明心學可說是傳統儒學往下走得最遠的一次，也因此對當代及後世都有深遠而鉅大的影響。

儘管文學復古與心學運動都有擴展參與成員的一面，但詩文寫作與心性學說畢竟有其門檻，加上各人的志趣有別，所以仍有部份士人不在這兩股風潮中。而且當這兩股風潮發展達到高峰時，人們

開始在詩文寫作上區別雅俗，⁶以及譴責心學末流的流弊，這顯示人們用某種或某些標準劃出界線，線內的才是預流，線外的便是附庸而不能算數，這跟擴展成員的趨向恰好相反。也因此必須等到下一波的制藝風潮興起，方才觸及到全體士人，讓士人都無法自外於這股風潮之外。如明末萬時華（一五九〇—一六三九）說：

世慘觚能以詩賦擅者什四五，不能為制舉藝者，百無一焉。⁷

萬時華是明末江西南昌人，以詩文與制藝聞名，也是南昌當地詩社與制藝文社的領袖，所以他的評論應可信。據他的估算，能詩文者僅十之四五，推測能談心性者的比例亦不高於此數，而相較下全體士人皆能作八股文，所以明末制藝風潮雖未如心學運動下及於庶民百姓，但對士階層的影響力則極大。簡言之，文學復古與心學運動的特色是往下及於中下層士人甚至庶民百姓，而制藝風潮則將全體士人捲入其中。以下便從這三波風潮切入談詩社、講會與制藝文社的發展。

文學復古運動起於十六世紀，大約在嘉靖、隆慶、萬曆三朝達到高峰，各地有大大小小的詩文社集，尤其以詩社為大宗，這些詩文社集雖未必都直接跟文學復古運動有關，但仍可視為是此大風潮下的產物。

當時一些重要的詩社常選擇在城市或城市近郊舉行，所以在蘇州、杭州、南京、揚州等幾個大城市常見士人穿梭在各個詩社中，

其中南京的詩社尤其值得注意。南京作為江南的文化中心所在，士人來自四面八方，聚集於此作短期或中長期的停留，加上當地的詩社眾多，所以南京的詩社組成多半較為鬆散而任意，不僅沒有固定成員，而且個別士人往往會同時在不同的詩社中。這提醒我們一件事：即我們不應把社集看得太嚴肅，而且應把作詩這件事當作士人表達個人情感或意志常用的方式。詩社聚會及吟詩唱和，可說是士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也是士文化的基本元素。

萬曆朝以後，南京當地興起大社或大會的風氣，如金陵社集、秦淮大社皆是，也是因為組成鬆散的緣故，這些大社往往帶有表演的性質，人們在乎的反而不是社集本身，而是這些炫耀式的展演，藉此成就聲名。⁸

南京以外的其他地區，如閩、廣一帶的詩社組成則另有特色，福建霞中社的成員較固定，⁹廣東的不少詩社則有賴於當地家族的支持，而且詩社成員很多都是同族族人。¹⁰而當明末南京流行浮華表演的大社的時候，也不是沒有歧聲異見，如明清之際的揚州便興起一種反江南風氣的聲音——儘管揚州也被列入廣義的江南範圍內。揚州跟南京一樣，都是外地士人聚集與生活的城市，明末陝西籍士人雷士俊（一六一一—一六六八）、王巖等人成立直社，標榜必須重振他們心目中正統的士大夫文化，而且強調須與江南士風保持距離。清初同樣由陝西籍文人李楷（一六〇三—一六七〇）、孫枝蔚

（一六三一）（一六九七）等人主導的社集，也把重點放在整頓士風以掃除江南浮華萎靡的風氣。¹¹

二、宗室與醫者的社集

文學復古運動並不只是往下擴展成員而已，同時也往上，宗室是較少被注意的一群，以宗室為主體的社集，在某些地方佔有重要的位置。

明代的藩王宗室向來是較不受注意的一群人，直到近年才陸續有碩博士論文研究各地王府，而一些藩王的墓葬發掘則頗引人矚目，另外也有關於藩王宗室著書、刻書的研究。不過，這幾年最受矚目的仍推 Craig Clunas 的 *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該書選擇山西與湖廣兩地的藩王，藉由檢視他們的文化品味與取向，討論作為 great court 的一部份的藩王，與文人士大夫、地方社會之間的交集互動。但迄今為止，仍較少人注意到宗室與社集的關係。

宗室主持社集並不罕見，如萬曆年間齊王孫朱承綏主持的金陵大社便廣為人所知，該社吸引許多知名士人前來與會，據《列朝詩集小傳》載：

萬曆甲辰（一六〇四）中秋，開大社於金陵，胥會海內名士，張幼于輩分賦授簡百二十人，秦淮妓女馬湘蘭以下四十餘人，

我們可從當時江西士人文集中看到士人與寧王府宗室共同舉行社集，以及彼此頻繁往來的情形，而他地士人如曹學佺（一五七四—一六四六）、錢希言（一五六二—一六三八）來訪，也會得到這些宗室的接待，並邀其入社。由於宗室不能擅離封地，所以這些宗室也常透過書信與不能來訪的江南士人往來唱和，甚至朱多烺還曾變換姓名為來相如，在後七子之一的吳國倫（一五二四—一五九三）的引薦下，前往江南拜見復古派的主盟王世貞，²⁰此皆可一窺寧王府宗室在江西詩壇的活躍程度。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貞常以五子或七子來稱呼同道，而包括朱多燝、朱多烺，以及下一輩的朱謀境（一五三〇—一六〇七）、朱謀境（一五三七—一六一九）等宗室，則與士人方來崇（一五五六年進士）、趙來亨（一五六八年進士）、彭翼等人合稱五子或七子，²¹似有仿後七子、續五子等稱號之意。

士人與宗室共同主持詩社的情形在晚明明末有變，這從當時社集成員可見一二。明代江西兩個最具代表性的詩社，一是嘉靖朝的芙蓉社，一是萬曆朝的匡山社。芙蓉社已如前述，而匡山社的核心成員則清一色是年輕一輩的士人。匡山社沒有宗室並非偶然，我們可以參考《皇明豫章詩選》，這是明末舒曰敬（一五五八—一六三六）與匡山社的領袖樊尚默（一六〇四年進士）共同選編的，這本詩選選錄不少匡山社士人的詩作，也有芙蓉社士人如余日德的詩作，但朱多燝等宗室的詩作則全未入列，而且全本詩選所選的詩人皆無宗室。我們若單純只看詩選，未必能發覺其中的異樣之處，

咸相為緝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須宴集，若舉子之望走鎖院焉。¹²

張幼于即張獻翼（一五三四—一六〇四），是當時江南一帶十分知名的士人，而該社既有妓女多人，亦可見這類社集主要還是以宴遊玩樂為主。這一點也很符合張獻翼的風格，據稱他會「刺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排日分類，傲而行之。或紫衣挾妓，或徒跣行乞」，¹³有許多任意放恣的的言行。

不過，更具代表性的，應屬江西寧王府宗室的社集。目前學界對明中期文學復古運動的焦點多放在江南一帶，而對同時期的江西詩壇關注較少，所以也較少注意到詩社中宗室的角色。明中期江西最重要的詩社芙蓉社，就是由名列「續五子」之一的宗室朱多燝與南昌士人領袖余日德（一五一四—一五八三）所共同主持的。

明代宗室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亦少有機會進入中央朝廷任官，所以部份宗室遂用心於詩歌吟詠。¹⁴在全國眾多宗室王府中，寧王府宗室的詩作成就頗為人所稱道，所以當時有「國朝宗藩之詩，寧府為盛」¹⁵之類的讚語，其中以朱多燝（一五三四—一五九六）、朱多烺（一五四一—？）、朱多燝（一五三〇—一五九一）幾人的詩名最著。¹⁶朱多燝是當時宗室之首，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弇州四部稿》收錄不少與朱多燝往來的信件，而朱多燝儼然足與朱多燝齊名，¹⁷亦有人譽之為江西宗室之首。¹⁸朱多烺的詩名在當時似稍遜於朱多燝、朱多燝，但在清初的評價則又遠高於二人。¹⁹

但若將該本詩選放在整個明中晚期江西詩壇發展史來看，便可發現宗室明顯被邊緣化。

宗室的邊緣化跟明末制藝風潮的興起有關。由於士人日益投注心力在制藝寫作上，加上明末許多制藝文社的興起，數量及聲勢完全凌駕於詩社之上，所以明末江西雖有詩社，但詩社成員跟制藝文社的成員幾乎重疊，而且變成以制藝為主，詩作只成附屬，亦即制藝才是主旋律，詩作只成了小調。連帶的，是否能夠寫作制藝反而成為最重要的事。

制藝與詩作間的換位，可參考陳弘緒（一五九七—一六六五）與傅占衡（一六〇六—一六六〇）二人的評論，陳弘緒，字士業，南昌人，傅占衡，字平叔，臨川人，二人分別是明末南昌、臨川一帶年輕士人的領袖，而兩地也是明末江西制藝文社最發達的地區，所以二人的評論頗具代表性。陳弘緒說：

八股學問，聰明之會也，三百年人主玉帛在是，即人才川嶽亦在是，故辛亥（按：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以來，八股未窺而能詩古文者，鮮矣。²²

傅占衡則說：

賦比興風雅頌，此詩人六義，特時文中一體耳，古文亦然，奈何薄八股。²³

陳弘緒說人才須從制藝中出，未能制藝則不能精擅詩古文辭。傳占衡則把詩的六義——賦比興風雅頌，說成只是制藝的一體而已。此皆可印證制藝是主旋律，詩作只是小調的判斷。

宗室既不必應科考，對制藝寫作自然生疏，但有時甚至會因不能寫作制藝而被評為能力有所不足。如以博學著稱的宗室朱謀瑋（字鬱儀，一五五一—一六二四），他活躍於萬曆年間，是謀字輩宗室中最知名的人物，曾有一百四十多位士人與朱鬱儀共結長松社，與同時期曹學佺在南京主持的金陵社桴鼓相應。²⁴長松社與金陵社都是詩社。朱鬱儀不擅長制藝，而以制藝著稱的江右四大家之一的艾南英（一五八三—一六四六）竟引以為憾，說——「吾尤以為歎」。²⁵

也因此，天啟二年（一六二二）朝廷開放宗科，允許宗室參加科舉考試以後，一些宗室紛紛投入科考，同時也加入制藝文社。朱鬱儀之子朱統銓便參與滕王閣社，²⁶這是繼匡山社而起的社集，既是制藝文社，也是詩社。²⁷朱統銓後來考取崇禎七年（一六三四）進士。

除了詩文社集以外，另有一些與士人有關的他類社集，較為人所熟知的，如張岱（一五九七—一六八九）與周暉提到的絲社與畫社，²⁸不過這兩個社集都有士人的參與，甚至是由士人所主持的，相較下明清之際醫者的結社更值得注意。醫者與士人的關係向來頗為密切，而醫者參與在士人的詩文社集中自屬情理之常，如成化年間程敏政（一四四六—一四九九）便多次贈詩文予醫官施彥清，從詩

久的地方，而許多為人所熟知的門人弟子都出自此地，被視為是陽明學的正統。

陽明心學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三方面，分別是講會、《傳習錄》與古本《大學》，以及陽明畫像，³²此處只談講會。陽明心學最盛的時候，常可見到各種講會，人們除了在縣級的書院聚講以外，也下及於鄉、村、族的講會，有些講會是心學家的門人弟子所倡導，也有些是當地士人受到心學風氣影響而自行組成的。講會舉行的頻率很高，大會是一年一次或數次，小會則可能一個月就有兩到三次之多。以王守仁的大弟子鄒守益（一四九一—一五六二）所在的江西吉安府安福縣為例，這是江右學派的重鎮，該學派的許多知名人物都出自此地，尤其鄒守益父子孫三代都是知名心學家，並主持當地講會。安福分作東、西、南、北四鄉，四鄉皆有書院，而且鄉以下，也常見幾村或幾族共同舉行講會，又或者是在家族內部聚講。除了講會以外，心學家還結合地方士人、家族，進行許多社會福利工作，這讓心學更能夠深入到地方基層，而心學家的聖賢形象也因此深植人心。³³

萬曆中期以後，我們看到陽明學講會規模的衰退，以及成員數目的萎縮，若單憑講會活動來判斷，可視此為陽明心學退潮的表徵，但其實陽明心學在其他方面——也就是對儒經的註解仍持續發揮影響力。這部份則跟文學復古運動帶來的影響有關。

文內容來看，施彥清應曾在程敏政的詩社中。²⁹

明末杭州一帶也有不少醫者參加當地士人社集，而這些醫者進一步仿照所參加的士人社集而另結醫者的社集。杭州的士人社集中以讀書社最著名，這是制藝文社，也是詩社，而包括盧復、盧之頤、張遂辰等醫者都曾參加該社，並與社中成員有很頻繁的往來。這些醫者遂沿襲讀書社的形式大會同盟，形成雅集，講經研學，甚至連《本草匯言》這本醫書也可能是依仿八股文選本的形式而編選，醫者彼此間甚至以「同社」稱之。士人也會做客醫者講堂。入清以後，由於士人的社事受到打擊，加上大量士人隱於醫的結果，讓醫者雅集更加興盛，清初侶山堂成為當時的雅集中心。綜言之，醫者講學移用了文社的組織形式而發展，而清初侶山堂更在相當程度上發揮類似於現代醫學社團的作用。³⁰

三、陽明學講會

陽明心學是與文學復古運動同時興起的另一股風潮，文學復古運動是文學運動，陽明心學則是理學運動。迄今為止關於陽明心學的研究，多集中在泰州、浙中與江右這三個學派。泰州學派向來被認為是庶民性最高的一派，而浙中學派有王畿（一四九八—一五八三）這位大儒主持，王畿對陽明心學的詮釋向來受到不少研究者的重視，而且明末浙中的證人社與清初講經會，都是影響力極大的講會。³¹至於江右陽明學派所在的江西，則是王守仁晚年停留最

文學復古運動主要是一場文學運動，跟經學沒有直接關係，但因以先秦兩漢之文為典範，促使士人四方蒐獵秦漢或秦漢以前的典籍，這也讓很多過去少為人知或不為人知的古籍得到重新刊刻與流傳的機會。這些重刊的古籍，或是被收入叢書中，或是被節選部份內容錄入選本，而各種選本的編輯刊行與廣泛流傳，讓士人有更多過目這些古籍的機會。蒙文通（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先生便指出：

在不讀唐以後書的口號下，開創了讀古書的風尚，把束縛在宋學末流的膚陋之弊，予以一次洗刷。清代漢學家所重視的一些古籍，明人都已經加以注意而進行了一些工作。³⁴

明末諸子書的流行及諸子學的復興便是因此而起。很多已數百年無人聞問關心的子書，如今都因重刊而被閱讀與審視，更有人援引其說來解釋儒經。託名歸有光（一五〇七—一五七一），而有文震孟（一五七四—一六三六）作序的《諸子彙函》，就是這波諸子學熱潮下的產物。

陽明心學對經典的解釋最終會歸於本心良知作為判準，由於不必字字句句回歸到文本的脈絡中求取解釋，所以在形式上較可能解開文本字句的約束。把這種解經法加以推行，則用來解經的資料也可以是來自四書五經及程朱學註解以外的其他典籍。於是士人在閱讀那些先秦兩漢典籍的時候，便很容易取用這些典籍作為解經的知識來源，若進一步將這些典籍的內容寫入制藝，便將影響制藝的寫

作內容。

這點可以從坊間流行的各式各類的儒經的註解書看出。當晚明末心學講會不復昔日盛況，甚至日趨衰微之際，心學卻影響坊間刊刻流行的註解書，尤其是對四書的註解，不少註解書都託名名家，但所註解的內容往往跟《四書集註》的大相逕庭，反而跟心學有互通之處。也因此，儘管明末制藝風潮取代陽明心學而興，但陽明心學卻因這些註解書而得以持續保有其影響力。

四、明末制藝文社

一般談到文人，較注意的是那些在城市中聚集、舉行詩酒雅集，逸遊玩樂的人，至於另外一大批，甚至應該說佔了絕大部份的、以科舉為職志的士人往往較不受關注。加上準備科舉考試是士人的基本職志，所以人們往往認為制藝只是士人為了應付考試所須習作的文體，而很少好好討論制藝及制藝文社的影響。

過去我們受到顧炎武（一六二三—一六八二）、黃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等人的言論影響，所以很容易對制藝有先入為主的負面印象，如顧炎武有「八股之害等於焚書」的激烈之論，黃宗羲則把明文之不競歸罪於士人專注於科舉業，這也導致長期以來人們極少正視明末的制藝風潮。但其實這是繼文學復古運動與心學運動以後更大的一股風潮，把全體的士人都捲入其中。許多士人不僅勤

稱有兩個重點：一是強調讀書；一是強調讀經或讀史。³⁷尤其是讀經更是最特別處。強調讀經的人認為一切知識都必須回歸到儒經作為本源，所以甚至把制藝的本質定義為詮釋五經。過去因科舉考試以四書場為重，而五經僅選考一經，所以士人多半側重四書而輕忽五經，如今則有不少人反其道而行，復社的領袖張溥（一六〇二—一六四一）說明通習五經的風氣之起，說：

明興，推本聖教，獨用五經取士，而《十三經註疏》一書亦復頒學宮，俾師生考識焉。然而制科之設，唯尚專經，諸父兄子弟，屈首揣摩，不敢復論繩墨之外。近乃古學振興，耻以一義自蓋，無慮春秋弦誦，即十三經而下，皆津津知所染指矣。³⁸

所以復社的前身應社，另名「五經應社」，便已開啟「分曹治經」的傳統，要求一人專治一經，然後集會討論，既分工合作，又相互貫通。至於「尊經復古」，則是從應社到復社都共同遵守的宗旨。³⁹這種從子史集到經學的進展，並且聚集於五經，除了是文學復古運動的更進一步以外，陽明心學則是另一個關鍵因素。如前述，因為陽明心學擴展知識的範圍，把各類典籍也納入解經的來源，才會從四書到五經的進展。

不過，過去大家較多聚焦在復社，卻忽略了比復社更早主盟制藝文壇，引領一時風氣的豫章社，尤其是以江右四大家為首的江西制藝群體所帶領的流風。我們必須同時看豫章社與復社，才能夠更

於練習制藝，把個人的制藝文稿刊刻出版，同時各地士人結成大大小小的制藝文社，刊行社稿，加上一些名家對制藝文章進行挑選並作批註，而這類選本往往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所以我們若是翻看明末士人的文集，往往會看到大量為八股文文稿、社稿或為選本所作的序跋，另外還有一些對八股文文體的嚴肅討論。

明末制藝風潮中兩個最知名的社集，一是江南的復社，一是江西的豫章社，兩社都主張改革制藝，試圖以制藝改造文風、士風與國運。復社還積極涉入政治事務中，而有「小東林」之稱，所以明末一波波的政治鬥爭中，幾乎都有以復社為首的這些制藝文社成員的參與，這也讓復社在明末眾多制藝文社中取得極高的聲名與代表性

如研究者指出，明末復社可說是文學復古運動的第三波（第一、二波分別是前、後七子）的代表性社集。³⁵這個判斷很有道理，也可以部份說明此時的制藝風潮與先前的文學復古運動的淵源。但我們若依循這個判斷看下去，則會發現這一波的文學復古運動與先前兩波有所差別，前兩波是文學運動，所以即使宣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主要指向的是詩文而已，當時所蒐羅的古籍，主要是子史集，而未包括儒經。但第三波卻已將復古的對象直接指向儒經。³⁶

復社的中心在江南，而明末江南不少社集已有轉向經史之學的傾向，而且有不少讀書、談經或讀史的社集出現，這類社團的名

全面掌握明末制藝風潮的發展。

與江南的發展方向相異，明末江西制藝文社很少以讀書、談經或讀史為名的社集，例如江右四大家之一的陳際泰（一五六七—一六四一）的文集中便有多篇為江西制藝文社所作的序，但都不見這類社名。不過，這不表示江西派不重視經、史之學，相反的，多讀書及重視經史子集的風氣其實是從江西士人率先提倡的。

在江西派興起以前的制藝文壇，所流行的是元脈派（或稱機法派）的文風，這一派講究寫作技巧，以及模擬各屆會元的作品，簡言之，就是把制藝當作作文比賽，而不追求讀書或學問的充實。⁴⁰於是以江右四大家為首的江西派首倡通經學古，艾南英與徐世溥（一六〇八—一六五七）分別說：

舉業至萬曆之季，卑陋極矣，自四家之文出，而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為高。⁴¹

豫章以古學倡天下者，三十年于茲。⁴²

既講究通經學古，則所須讀的書極多，包括經、史、子、集，艾南英說：

制舉雖小，然必本之經以求其確，本之史以雄其斷，本之諸子以致其幽，本之歐曾大家以嚴其法，若是是亦制舉之泉源也。⁴³

陳弘緒亦呼應說：

吾江右制藝，世共指爲異而奉之，然吾觀江右之文，類本之經以深其源，參之史以究其變，博之歐蘇諸大家以蕩其氣。⁴⁴

在先前元脈派的流風下，許多士人除了四書以外，很少再讀其他書，所以艾南英等人要求通讀各類典籍的主張，不僅是空谷足音，而且極易引起他人側目或反對。南昌袁崇熹的例子正好可以說明，袁崇熹亦屬江西派，他在會試途中曾駐足揚州，當地年輕士人雷士俊入其門下，而袁崇熹對他的要求是——

是時士之舉業，類勦襲臬腐以欺有司，白首講誦者，考亭《四書》及所占經，句釋、字詁，粗解其說而已。先生告以文之源流，上自《易》、《詩》、《書》、《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周禮》、《儀禮》、《孝經》、《爾雅》，中至《史》、《漢》，下及韓、柳、歐、蘇、王、曾諸家之指。⁴⁵

所讀的包括十三經、史書與唐宋八大家文。但雷士俊的父親的反應卻是——

士俊聞而慕之，慨然有事於古，然府君頗嫌之，嘗倚門立，士俊侍，謂曰：《學》、《庸》、《語》、《孟》，辭約理盡，不深求力索，而但務博覽，此先民所耻，以爲記問之學者也。⁴⁶

雷士俊的父親認為專注在四書即可，畢竟這才更直接有利於科考，而且更直斥博覽群籍將被「先民所耻」。

五、小結

明人好結社，而有明三百年的社集，在數量及種類上極眾亦極多樣，所以我們不能以單一解釋來說明明代社集的發展，而必須放到各個脈絡下討論。本文從明中晚期的三波風潮來談詩社、心學講會與制藝文社的發展，我們看到詩社的多元多樣，既有展演性質的大社，也有揚州士人對士風的反省與約束，而心學講會則是讓心學可觸及於各色人等，而且讓士人對經典的解釋更為自由。也因此，當來到明末的制藝風潮，制藝文社的影響便不僅僅只在制藝本身而已，江南與江西兩地的制藝文社所帶起子學與經學的熱潮，以及如何影響清初的學風，都很值得我們未來更多的研究。

註釋

- 關於這三股風潮與士人的關係，另請參考張藝曦，〈明中晚期的思想文化風潮與士人活動〉，《中華文物學會二〇一九年刊》（臺北，二〇一九），頁一二八～一二六。
- 如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對眾多社集作出分類，而何宗美的《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則是大規模蒐羅詩文社集與制藝文社的資料，以討論文學流派與文學思潮的轉變。關於復社的專門研究，則有日本學者小野和子的大作《明季党社考：東林党と復社》，主要是從政治史及政治文化史的角度談萬曆朝以後從東林黨到復社的黨爭。丁國祥的《復社研究》則是從文學史的角度討論復社成員的活動。另外，馮玉榮《明末清初松江士人與地方社會》則聚焦在幾社成員的社集活動與地方角色。

江西派倡導「通經學古」，讓士人不再把制藝當作作文而已，而在萬曆晚期及天啟年間引領制藝文壇一時之風氣。儘管江右四大家在科考上皆不順遂，仍無損其聲名。在博覽經、史、子、集的要求下，當天啟年間興起諸子學的熱潮時，不少士人將所讀的諸子書內容寫入制藝中，並蔚然成風，而且更嚴重者還有鈔撮或造作子語的偽子的流弊，許多人便將偽子之風歸罪於江西派。

流風既開，便難歇止，所以偽子之後，緊接著是偽經。偽子跟江西派有關，而偽經則跟復社的張溥等人有關。由於張溥主張復興經書，而且在文章中大量鈔撮經語，甚至摹倣五經的讖緯文字，於是造成偽經的流弊，如黃宗羲便批評說——

是時偽子之後，點者返之於經，然而鈔撮經語，仍不異於偽子。⁴⁷

儘管偽經之風並非張溥一人之責，而黃宗羲所指責的也不只是張溥一人而已，但張溥跟江西派都是啟其端之人。

從古籍的復興、陽明心學擴大知識範圍、制藝對經書的詮釋，以及明末偽子、偽經的風氣，顯示明末已形成一股回歸到儒經的風氣，而且還必須面對許許多多對經、子、史的各种歧異或多元多样的解釋。這應是為何清初士人必須取證於經書，同時著手整理經籍的原因及脈絡所在。

- 文學復古運動在詩、古文辭各有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是最讓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復古派流風下的江西社集對古文辭較少措意，而更多側重在詩作上。如芙蓉社的余日德所留下的集子，十四卷全是詩作，而王世貞所稱道的也是他的古近體詩；同社朱多雉雖無詩文集存世，而其社友朱拱樞、朱多燝、王士昌等人所留下的也是詩集。匡山社亦屬於詩社性質，戴九玄所留下的《匡山社集》，內容雖有社友相互唱酬之作，但社集中如汪應妻、喻氏兄弟、鄧文明等人都以詩作著稱，萬時華亦因詩作見賞而受邀與會。

- 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一二），頁一七九～一八〇。
- 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頁一七九～一八一。

- 如顧天垓說：「夫雅俗之辨微矣，僅僅詩與文之能不能耶！」就是以雅、俗在作區別，指出當時人把僅能搖筆吟哦，而不能作出好詩文的人劃出圈外。見顧天垓，《顧太史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二〇〇〇）集九，卷三，頁二五～二六。

- 萬時華，《溉園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一四四，卷一，〈彙刻西子秋序〉，頁二四～二五。

- 王鴻泰，〈城市舞台——明後期南京的城市游樂與文藝社群〉，收錄在張藝曦、王昌偉、許齊雄、何淑宜編，《一六～一八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將出版）。

- 許齊雄，〈從詩社到吾黨：漳州霞中社的政治性〉，收錄在張藝曦等編，《一六～一八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

- 黃聖修，〈宗族與詩社：明末廣東詩文社集研究〉，收錄在張藝曦等編，《一六～一八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黃聖修比較江南與廣東的詩社，認為江南的詩社組成較為嚴謹，這個判斷可能不適用於南京的詩社。但不同地方的詩社確實各有特色，而廣東詩社與宗族的關係便很值得注意。

11. 王昌偉，〈明末清初秦地文人在揚州的結社活動〉，收錄在張藝曦等編，《一六〓一八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
12.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丁集上，「齊王孫承綵」條，頁四七一。
13.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張太學獻翼」條，頁四五三。
14.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二〇〇二）五四冊，《敦宿堂留書》，卷一，〈管理石城王府事鎮國中尉朱公傳〉，頁二八。
15. 徐炯，《筆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卷四，〈宗藩詩〉，頁一〇八〓一〇九。
16. 胡應麟在其《詩數》中談及所往來的宗室，除了朱睦㮮以外，便推朱多燦等三人，見胡應麟，《詩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八），頁三五九。
17.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七七七。
18. 李維楨，〈朱宗良詩集序〉，在朱多燦，《朱宗良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二五年刊本），卷首，頁一。陳田也評其詩說：「明藩王之工詩者，當以秦簡王誠泳為稱首；王孫之工詩者，當以瑞昌中尉多燦為稱首。」見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甲籤卷二下，頁六八。
19.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集一六九八，卷一，頁二一。
20. 宋長白，《柳亭詩話》，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五）集四二一，卷二七，頁三〓四。朱多炆之子朱謀埏似受其父影響，所以也愛變姓名出遊。在《匡山社集》收錄不少首的詩作中，都提及來鯤（字子魚），此人即朱謀埏。

30. 關於醫者結社的研究，請見馮玉榮，〈醫者同社與研經講學：以明末清初錢塘侶山堂為中心的討論〉，收錄在張藝曦等編，《一六〓一八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
31. 王汎森，〈清初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八本三分（臺北，一九九七），頁五〇三〓五八八。
32. 《傳習錄》與古本《大學》，以及陽明畫像的研究，請參見張藝曦，〈明中晚期古本《大學》與《傳習錄》的影響〉，《漢學研究》二四：一（臺北，二〇〇六），頁二三五〓二六八；張藝曦，〈明代陽明畫像的流傳及其作用——兼及清代的發展〉，《思想史》五（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一六），頁九五〓一五五；呂妙芬，〈陽明學講會〉，《新史學》，九：二（臺北，一九九八），頁四五〓八七。
33.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二〇〇六）。
34. 蒙文通，《古史甄微》（成都：巴蜀書社，一九九九），〈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頁三七六。
35. 相關研究請見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八）。
36. 關於第三波文學復古運動指向經書的研究，請見王汎森，〈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大變動〉（未刊稿）。
37. 王汎森，〈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八本三分，頁五〇三〓五八八，尤其是五〇五〓五一四。
38. 張溥，〈十三經類語序〉，在羅萬藻編，《十三經類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二一七，卷首，頁三〓四。
39. 陳時龍認為因應明末對經學的重視，也有「釐正經學」的要求與嘗試。

21. 如歐大任曾受邀弋陽王府竹在亭作客，便以「稱詩七子盡風流」稱七人，見歐大任，《歐虞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二〇〇〇）集四七，《北轅集》，卷一，〈朱宗良、方士功、朱貞吉、朱魏甫、朱佳甫、趙脩甫、彭穉脩邀集竹在亭得秋字〉，頁三。另一首詩題〈答朱宗良、方士功、朱貞吉、彭穉修、趙修甫五子〉，又以五子稱之。
22. 傅占衡，《湘帆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一六五，卷二，〈晁次柳餘艸序〉，頁五〓六。
23. 傅占衡，《湘帆堂集》，卷二，〈晁次柳餘艸序〉，頁五〓六。
24. 歐陽桂，《西山志》，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七二，卷七，〈王孫朱鬱儀墓〉，頁九。
25. 艾南英，《天傭子集》（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八〇），卷二，〈朱咸一近簪序〉，頁二七。
26. 《明詩紀事》有收錄其詩作〈滕王閣留別同社〉，見陳田，《明詩紀事》，甲籤卷二下，「朱統銓」條，頁七八〓七九。
27. 萬時華，《溉園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一四四，卷二，〈戴大圓先生全集序〉，頁三。
28. 張岱，《陶菴夢憶》（臺北：金楓出版社，一九九六），卷三，〈絲社〉，頁二〇：「越中琴客不滿五六人，經年不事操縵，琴安得佳？余結絲社，月必三會之。」周暉，《二續金陵瑣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一六編（臺北：新興書局，一九八八），頁二三八三〓二三八四：「少岡王文耀善畫，乃利家之出色者，且好事，多收宋元名筆，因結一畫社于秦淮，邀而入社者皆名流。」
29. 程敏政與施彥清の往還資料，可參見何宗美，《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下冊，頁八四〓八五。

- 請見陳時龍，〈明代的科舉與經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八）。
40. 關於元脈派的介紹，請見龔篤清，〈明代八股文史〉（長沙：岳麓書社，二〇一五），第五章：孔慶茂，〈八股文史〉（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八），第四章。
41.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三，〈四家合作摘謬序〉，頁四一。
42. 徐世溥，《榆溪逸槩》，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二六冊，卷四，〈鴻輞集序〉，頁一一。
43. 艾南英，《天傭子集》，卷三，〈戴子年淇上草序〉，頁三五。
44. 陳弘緒，《陳士業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五四冊，《石莊初集》，卷二，〈李平叔文序〉，頁三九。
45. 雷士俊，《艾陵文鈔》，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九〇，卷一三，〈太學生顯考府君權厝誌〉，頁四。
46. 雷士俊，《艾陵文鈔》，卷一三，〈太學生顯考府君權厝誌〉，頁四。
47. 沈善洪等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冊一〇，〈萬祖繩墓誌銘〉，頁四七三。
48. 關於取證於經書，請見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在氏著，《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七），頁一二一〓一五六。



Friends Through Culture

A Special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on Elegant Gatherings

Issuer / Mi-cha Wu

Chief Editors / Wanru Lin

Authors / Ihsi Chang, Wanru Lin

Editorial Assistants / Dai Hong Yu, Hong Jhen Wei

Administrative Editors / Huei-hsien Lin, Pei-ju Hsu

English Translator / Donald E. Brix

Photographers / NPM Photography Team

Publisher /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ddress /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Tel / +886-2-2881-2021

Fax / +886-2-2882-1440

Website: <http://www.npm.gov.tw>

Designer & Printer / Suhai Design & Production

Address / 5F-1, No. 35, Guangfu S.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63, Taiwan (R.O.C.)

Tel / +886-2-2761-8117

Fax / +886-2-2761-9034

Distributor /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rt Development Fund

Address /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Tel / +886-2-2881-2021 (ext. 68977)

Direct Line / +886-2-2883-6887

Fax / +886-2-2883-8929

Postal remittance account / 19606198

Email / service@npmeshop.com

First edition / October 2019

Price / NT\$ 1,150

ISBN / 978-957-562-822-2

GPN / 1010801490

Copyright ©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以文會友：雅集圖特展 / 林宛儒主編。-- 初版。

-- 臺北市：故宮，民 108.10

面；公分

ISBN 978-957-562-822-2 (平裝)

1. 書畫 2. 博物館特展

941.6

108014799



以文會友



雅集圖特展

發行人 吳密察

主編 林宛儒

文字撰述 林宛儒、張藝曦 (按姓氏筆畫排列)

編輯助理 洪禎蔚、戴鴻裕

行政編輯 林慧嫻、徐珮茹

英文翻譯 蒲思棠

攝影 故宮攝影小組

出版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一一一四三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二二一號

電話：(〇二)二八八一—二〇二一

傳真：(〇二)二八八一—四四〇

網址：<http://www.npm.gov.tw>

設計印刷 四海圖文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一〇五六三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三五號五樓之一

電話：(〇二)二七六一—八一一七

傳真：(〇二)二七六一—九〇三四

總代理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

一一一四三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二二一號

電話：(〇二)二八八一—二〇二一 轉六八九七七

專線：(〇二)二八八三—六八八七

傳真：(〇二)二八八三—八九二九

郵政劃撥一九六〇六一九八

電子信箱：service@npmeshop.com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十月初版一刷 平裝

定價 新臺幣一一五〇元

國際書號 978-957-562-822-2 (平裝)

統一編號 101080149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